观察

契丹服饰要比我们想象的华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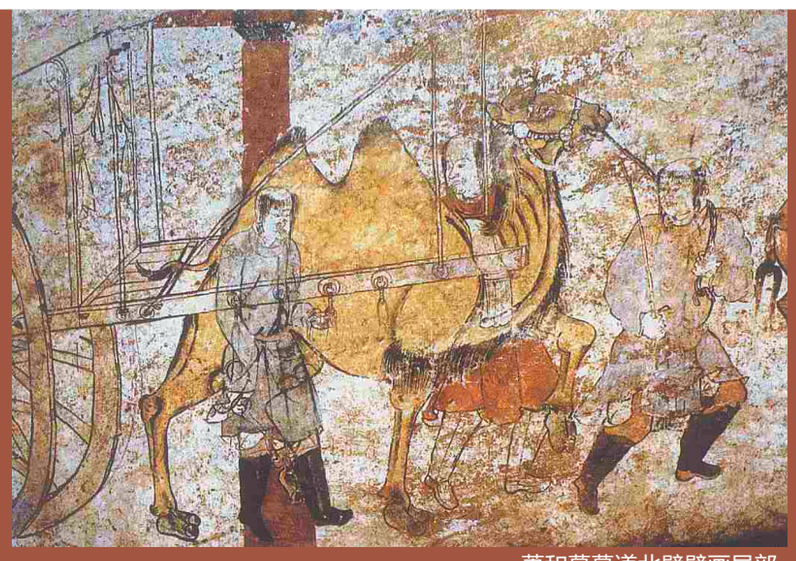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朱忠鹤

粗布麻衣随便裹身，毫无美感。在一些人的认知里，这就是契丹服饰。即使在一些以契丹和辽朝为主题的影视剧里出现了设计精良、制作精美的服饰，一些人看后仍不屑一顾，认为这是胡乱编造的。

“很多人的认知是不对的。实际上，契丹服饰要比我们想象的华美。”专注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多年的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李薏提出不同看法。



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床金沟5号墓天井东西壁绘车舆随从。



萧和墓墓道北壁壁画局部。



中国丝绸博物馆馆藏蓝色团雁纹锦局部。



庆州白塔发现的橙色罗地刺绣联珠云龙。

制图 董昌秋

法库叶茂台出土较为完整的辽代丝织品

50多年前，在法库叶茂台辽墓群，考古人员发现了成套贵族服饰与大量纺织品。为了安全保护这些脆弱的纺织品，辽宁省博物馆“古代辽宁”展仅展出极少部分。记者透过展柜看到，虽隔千年，但这些纺织品仍纹理清晰、气韵华美，尽显契丹贵族衣冠风采。

年过九旬的辽代研究专家冯永谦曾参与法库叶茂台7号辽墓丝织品的发掘全过程。他告诉记者，在7号墓里，曾出土体系完备、品类丰富的辽代丝织品，囊括绢、罗、绮、纱、锦、绒圈、缂丝七大类别90余个品种，是极为难得的辽代纺织文物。

据冯永谦回忆，发掘7号墓时，考古人员在墓室内发现了一座棺木小帐。这座小帐安置在砖块垒砌、高30厘米的平台之上，平台表面铺设木板作为支撑基底。石棺则完整放置于小帐内部，小帐与石棺之间仅有约20厘米的间隙。

考古人员开启小帐，掀开石棺木盖后，发现了墓中女性墓主的遗骸，其身上覆盖着一床海水金龙缂丝夹被。由于文物历经千年埋藏，丝织品质地脆弱，直接现场剥离极易造成损毁。为最大程度保护文物，考古团队把胶合板等工具做成专业底托，将墓中所有丝织品整体平稳托举、封存、转运，送至辽宁省博物馆进行专业处理。后续冯永谦和同事耗时整整一周，小心翼翼分层剥离，才完整清理出全部丝织品文物。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保存如此完整的辽代丝织品。”冯永谦说，这批文物极尽精美华丽，品类十分齐全，除被褥织物外，还包含衣裳、裤装、冠饰、辽代特色高翅帽等各类贵族服饰配饰，完整展现了辽代高端纺织工艺的风貌。

这批珍贵丝织品文物，也直观印证了辽代纺织产业的高度发达。辽朝时期，吸纳了大量中原地区的能工巧匠，中原先进的烧瓷、织锦等手工业技术，在辽地得到广泛传承与发展。当时在兴中府（今辽宁朝阳）设有专门的养蚕基地，产出的优质蚕丝原料，主要供应辽上京祖州工坊进行深加工，充足的蚕丝原料与成熟的织造技艺，为辽代服饰工艺奠定了坚实基础。

辽朝服饰也有等级之分

“我们首先应该纠正一个概念，就是契丹服饰与辽朝服饰并不是同一概念。”李薏说，契丹服饰仅仅指契丹本民族固有的传统衣冠，辽朝服饰则不然。虽然辽国是由契丹民族创建的，但辽国中除了契丹民族外，还有汉、奚、渤海、女真、党项、阻卜、室韦、乌古、敌烈、回鹘等很多民族，有些民族的服饰和契丹服饰是不一样的。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辽朝实行南北二元体系，所以，服饰实际上也包含了两套并行制度。一类是“国服”，是北面契丹臣僚在礼仪场合穿着的服饰；另一类是“汉服”，是南面汉官沿袭的五代晋人衣冠遗制，所以说，辽朝服饰其实是一个多民族多元共存的体系。

具体到契丹服饰，在日常服装上，契丹人以袍服为主。因为是游牧民族，所以契丹服饰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窄身、窄袖等合体裁剪，这极大方便了马背骑行。此外，左衽、自由互换的领襟结构以及衣袍的后开衩结构也是契丹服饰的一大特点。

李薏提到，契丹服饰还有一个很有特点的设计，叫穿孔闭合系统。

什么是穿孔闭合呢？简单说，衣服上不缝制传统纽扣，而是在衣襟、衣边、背带还有皮料的边缘直接打出小孔，再用皮绳或者丝带穿过这些孔洞，打结捆扎，把衣襟收紧固定，靠这种方式把衣服穿得严实合体。

和中原王朝相仿，辽朝对契丹贵族的服饰款式、穿戴规矩，有着十分细致严格的要求。辽代的“国服”借鉴了中原的服饰制度，一共分成六大类：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田猎服、吊服。对应着祭祀、上朝办公、打猎、丧葬等不同场景，不同阶层的人，要按规矩穿戴对应的服装。

从服饰颜色上来看，红色、紫色是辽代上层统治阶层才能使用的色彩。史料记载祭服制度：“祭服：皇后戴红帕，服络缝红袍，悬玉佩，双同心帕，络缝乌靴。”

绿色同样属于贵族可用的颜色。书中记载常服：“绿花窄袍，中单多红绿色。”辽代的汉服体系里也有规定，五品以上官员，可以穿紫色官袍。

不光是颜色，带金的织物管控也十分严格。辽圣宗时期，曾两次下达诏令，禁止普通百姓穿着带有金饰的衣物。就算是皇亲贵族，如果想要使用这类服饰，也必须提前上奏申请。

再看服装材质，契丹贵族大多使用丝绸面料。而毛毡、裘皮这类服饰，既和他们游牧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也有明确的等级划分。史料记载：“贵者披貂裘，以紫黑色为贵，青次之。又有银鼠，尤洁白。贱者貂毛、羊、鼠、沙狐裘。”简单来说，紫黑色貂裘地位最高，青色貂裘次之，洁白的银鼠皮也十分珍贵；地位低下的人，只能穿貂毛、羊皮、鼠皮、沙狐裘这类相对普通的毛皮。

北宋也受到辽朝服饰影响

辽朝与北宋，南北相望，辽朝在受到北宋文化影响的同时，北宋也受到辽文化的影响。李薏表示，具体到服饰上，北宋民间会接纳一部分契丹服饰样式，毡笠、吊敦就曾在宋朝流行。

吊敦，也叫钓敦，《宋史》中有解释：“钓敦，今亦谓之袜袴，妇人之服也。”根据这个说法，钓敦就是连袜裤。这种设计便于骑马，套穿靴子时可以避免裤管卷曲。这种服饰后来传到宋朝，民间很喜欢，北宋官府却把它当成少数民族奇装异服，多次下令禁止老百姓穿。

而在辽朝的统治疆域之内，汉人并不会被强制改换契丹服饰。但各民族长期杂居共处，到辽代晚期，燕云地区形成胡汉服饰双向交融的局面。河北平泉石室墓壁画中，契丹侍者与汉人侍者相对而立，左侧契丹侍者髡发，身着圆领窄袖袍，腰束帛带；右侧汉人侍者依旧蓄发裹巾，身穿交领袍，衣襟却采用契丹风格的左衽，这正是汉人服饰受到契丹文化影响的实物例证。

实际上，同一时期的契丹服饰与北宋服饰，存在诸多相通相似之处。二者都继承了唐代丰厚的文化遗产，纺织技术水平大体相当，丝绸装饰纹样也有大量重合。莲荷纹，是辽与北宋佛教艺术、世俗装饰当中十分常见的题材。石榴纹寓意多子富足，织物上常常将石榴与童子形象相结合，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辽代“夹缬彩绘童子石榴罗带”，上面的穿花童子就是宋辽两地广为流行的图案。

本文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面对面

一件首饰汇集欧亚不同地域文化符号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温润的橘红色，独具特色的造型，在位于锦州北镇医巫闾山辽代帝陵的陪葬陵寝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数量不一的精美琥珀饰品。辽朝贵族钟爱琥珀，尤其喜欢将琥珀制成饰品佩戴，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契丹贵族十分喜欢雕刻精美的琥珀饰品。



锦州北镇医巫闾山辽代帝陵遗址群出土的琥珀项链。

辽朝贵族痴迷琥珀，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张力介绍，辽国本土并不出产琥珀，原料来自波罗的海，依靠草原丝路贸易、西域诸国进贡流入辽境，获取成本极高，属于难得的域外舶来珍宝。因为普通阶层无力拥有，琥珀首饰、琥珀葬器，成为贵族阶层财富、权力与身份地位的直观标志，也是辽代上层彰显自身贵族身份的器物。

张力说，其实除琥珀外，辽朝贵族也喜欢玉石，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和玉石之路，产自新疆的玉器也源源不断地进入辽朝宫廷。

“琥珀还是一味中药，具有安神作用。”张力补充道，早在汉代，《神农本草经》就首次将琥珀收录为药材，确立了它安神定志的功用。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记载“松脂沦入地，千年所化”，还提到“刮屑服，疗瘀血至验”。发展至唐宋时期，《药性论》《本草拾遗》《日华子本草》等多部医籍进一步补充了琥珀活血散瘀、止血生肌等功效。因此，这也是辽朝贵族喜欢佩戴琥珀的重要原因之一。

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名誉院长、东北亚走廊研究院院长崔向东表示，辽朝墓葬中出土的这些精美琥珀原材料，绝大部分不是产自辽朝本地，而是来自遥远的波罗的海沿岸。

那么，远在异域的宝石，如何跨越万水千山来到辽地的？崔向东介绍，中国东北处在东北亚的中心位置，自古就形成多条民族交往与贸易通道，这些通道共同构成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体系。其中，草原丝绸之路，也被称作黑貂之路，就是把波罗的海琥珀输送到辽朝的核心通道。

欧洲当地有一条著名的“琥珀之路”，波罗的海出产的琥珀，顺着这条贸易线路向南，抵达地中海区域，之后再接入草原丝绸之路，一路向东，经过中亚、西域，最终进入辽朝境内。《辽史》《契丹国志》都记载，西域多国会向辽朝进贡琥珀，印证了这条物资流转的路径。

辽朝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向南可以和中原开展文化、物资交流，向西能够连通中亚、西亚，保持草原丝路的畅通，让域外珍宝源源不断地流入辽地。古代辽宁，正是整个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带。兴中府，也就是今天的辽宁朝阳，当年还设立绫锦院，管理丝织手工业，各类商品在这里流转集散。

这些远道而来的琥珀，到辽代工匠手中之后，被赋予全新的文化内涵。以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琥珀璎珞为例，器物之上雕刻行龙、蟠龙、行龙戏珠、云纹对鸟、荷叶双鱼等纹样，龙、凤、狻猊、游鱼，都是中原汉文化里流传已久的传统题材，和唐宋艺术一脉相承。心形、T形这类琥珀构件，又带有西方文化的印记。一件首饰，同时汇集欧亚大陆不同地域的文化符号。

崔向东表示，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不只连通东北和蒙古草原、中亚西亚的草原丝绸之路，还连接东北内地的辽西走廊，通往俄罗斯远东、北海道的海西东水陆城站之路，通向朝鲜半岛的古营州道，连通环渤海、朝鲜、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还有东北亚洲际陆桥冰上走廊。一条条通道，不只是商品运输的商道，更是文明互鉴的纽带。

一件件琥珀文物，见证着贸易往来与文化交融。小小的琥珀，跨越遥远距离，落于辽朝贵族身边，它既是贵族身份的象征，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物见证，直观展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逐步形成的历史进程。